



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主编 尹绍亭 夏代忠

现代民族学 (上卷)

第一册

Modern Ethnology Volume I

周光大 主 编
王光荣 柏贵喜 副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主编 尹绍亭 夏代忠

现代民族学（上卷） 第一册

周光大 主 编
王光荣 柏贵喜 副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民族学. 上. 1 / 周光大主编.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ISBN 978-7-222-05554-4

I. 现… II. 周… III. 民族学—研究—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0730 号

出品人: 汤汉清

策 划: 尹 杰

责任编辑: 尹 杰 李锦雯

装帧设计: 王曦云

责任校对: 余 祁 缪 伟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现代民族学(上卷·第一册)
作 者	周光大 主编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90 千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国防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5554-4
定 价	196.00 元(全四册)

尊敬的读者: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总 序

尹绍亭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是对人类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 它有英美等国的广义概念和德奥等国的狭义概念之分; 民族学 (ethnology) 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文化。大致而言, 德奥等国的民族学即相当于美国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派之中, 对于民族学的理解和认识却不尽相同。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是舶来的学科, 其状况类似日本, 虽然学界同时使用着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名称, 然而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本丛书名为“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即沿袭我国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长期并用的惯例。

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 是研究人类文化或人类行为的学问。具有文化和学习文化的能力, 是人类与其它生物的最根本的区别。文化作为人类的基本属性, 使得文化的学习成为人类终生不可缺少的功课, 正因为如此, 文化的研究便不可或缺。人类学在发达国家之所以为社会民众普遍熟悉和重视, 并始终被作为大学基础教育的学科, 原因即在于此。然而, 当前该学科所显现的稳步趋热的现象, 却另有缘由。

在当代社会, 崇尚工业与信息、物质和技术, 文化往往被忽视和被边缘化, 然而许多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领域的重大的危机、纷争和问题, 根源却非工业信息和物质技术, 而在于文化。例如现在有的国家因捕鲸而遭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而当事国却不甘示弱, 认为坚持本国的“文化传统”无可非议; 又如西方国家惯于攻击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 发展中国家则以“应理解和尊重国别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予以回应, 政治性的指责被判别为文化的偏见; 再如时下全球变暖危及人类生存成为热门话题, 如果追究人为的因素, 那么工业文明的弊端无疑就是“罪魁祸首”。此外, 君不见中东战火无

穷尽，生灵涂炭灾难深！有人说那是石油的战争，而“文明冲突”的解释，却令人耳目一新。国际大事如此，国内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现象和出现的种种问题，亦无一不与文化相关联。面对当代社会的困惑，文化的审视和诠释显示出了无可取代的魅力。那么作为致力于文化法则研究的不同于一般文化学的人类学因此顺势而兴，渐露显学之态，也便不足为奇了。

回顾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史，可用四句话加以形象的概括，那就是“生于动荡，立于国难，少壮挫折，中年复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引进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其时军阀割据，动荡不安；此后抗战八年内战四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开拓者们就是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辛勤耕耘，筚路蓝缕；1949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人类学和民族学竟被看做资产阶级的学科而取消；80年代改革开放，清除了“极左”思潮，人类学民族学才得以恢复和繁荣。沧桑百年，斗转星移，现在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可以说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虽然如此，然而如上所述，面对当前国内外悄然兴起的文化自觉和无所不在的文化诉求，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无疑承受着巨大的挑战。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而进行学科的建设，如何在融入国际学界的同时努力实现本土化，如何普及人类学民族学的知识以提高国民的教养和素质，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应用研究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等，均为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课题如山还得从基础做起。就学术事业而言，优秀成果的产出和积累始终是重要的基础工作。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多年来笔者在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同时，也先后负责主编过几套丛书，为促进学术的交流和发展添砖加瓦。此次云南人民出版社秉承奉献社会、光大学术的一贯宗旨，不惜人力物力的巨大投入，决定出版“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我们能参与其事，感到十分荣幸。学术贵在创新，一套好的丛书也必须有独到的创意和追求。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第一，尽可能汇集老中青几代学人的作品。如前所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从产生至今，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纵观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人类学民族学丛书，还没有系统地反映上述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成果集成，这是一个缺憾。当然，现在要弥补这个缺憾是比较困难的。众所周知，第一代人

类学民族学家大多已经辞世，除了他们广为人知的经典著作之外，欲搜寻其传世很少或者未曾面世的遗作，困难不小。所幸的是，本丛书觅求到了那一时代几位著名学者的大作：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方国瑜先生的《滇西边区考察记》，江应梁先生的《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三位先生的大作虽然不可能充分反映同时代学者的业绩，然而毕竟使丛书增添了我国早期人类学民族学的光辉，而且其时学者们的学风、学品、学问已昭显于其中。20世纪50年代成长的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目前健在者尚多，不过多已迈入古稀之年。他们长年的耕耘积累，大多整理出版了；但身手尚健，老骥伏枥，志趣不减，把握潮流立足前沿笔耕不辍者，已屈指可数。令人欣喜的是，恰恰是这一代学人中的几位有影响的学者，为我们奉献出了其代表性的著作：汪宁生先生的《民族考古学探索》，杜玉亭先生的《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严汝娴女士的《摩梭母系制再研究》。数量也仅为三册，虽然远远不能反映同代学人的伟业，然而作为承前启后的桥梁，那一代学者的理论功底和田野调查的水平也足可窥见一斑。有了上述两代学者的作品的支撑，加上选择相对容易的中青年学者的著作，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纵向的系列，这可以说是本丛书的一大特色。

第二，关照了当代多样性的学术取向。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草创发展阶段，老一辈学者们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优选国外的理论，通过创造性的应用，较快地实现了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形成了高水平的专家队伍，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尊敬。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可参照选择的理论方法还不多，仅为进化论、传播论和功能论等。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受“左”的影响，人类学民族学被误解为资产阶级的学科而被取消。然而其时学术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此领域和相关专业的许多学者实际上仍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事着民族调查与研究，但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基本断绝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学术环境的改善，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众多理论方法迅速被引进，新的理论流派令人目不暇给，犹如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错综复杂，蔚为壮观。本丛书的选题，注意到了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取向多样性的特征，除了有历史、考古、生态、经济、饮食、认知、象征、宗教、婚姻家庭、政治、

艺术以及学术史的专题研究著作之外，还特别组织全国的学者编写了包容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的《现代民族学》和全面反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两部综合性著作的写作，也力求有所突破。国内以往的概论和通论，皆致力于介绍西方学者的著述，完全是外向的视野。而这两部著作则不落窠臼，在进行国外理论流派梳理的同时，亦重视本土学术成果的整理和研究。关照了当代多样性的理论取向，使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互融，并重视本土研究成果，形成了本丛书的又一个鲜明特色。

第三，个案研究、跨文化比较和宏观理论研究兼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人类文化，范围十分宽广，内涵极其丰富，其研究和写作的样式自然也不拘一格。然而，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必有其专门的研究视角和独特的研究方法，人类学民族学也不例外。众所周知，其基本的与众不同的研究途径便是田野调查的实证方法。迄今为止，该学科能够称得上经典的著作，即多为此类作品。时下标榜人类学民族学的所谓“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拼盘”“杂烩”式的作品不少，看似时髦，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伪劣，说穿了那不过是逃避田野的障眼之法。本丛书对此类著作自然不感兴趣，所选专著绝大部分即为深入扎实的田野实证之作。而田野研究又分为两类，一类为定点的个案研究，另一类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本丛书之中，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杜玉亭的《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严汝娴的《摩梭母系制再研究》，杨福泉的《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郑晓云的《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等，便是个案研究的规范而扎实的作品。跨文化比较研究，在本丛书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汪宁生的《民族考古学探索》，尹绍亭的《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郭家骥的《发展的反思——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变迁的人类学研究》等，即属此类。我们说人类学民族学是实证的学科，所谓“实证”，那就是用从田野获取的资料和研究来验证理论。以微观洞察宏观，以特殊阐释普遍；反之，从宏观探究微观，从普遍解读特殊。该学科所做的学问，就是这样的田野和理论的互动循环。由此可知，除了田野实证研究之外，宏观的理论研究也不可或缺。为此，本丛书特别选编了《现代民族学》和《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两本宏观性的理论

著作。两书的作者们均以开阔的视野，结合中国本土的研究成果，整理阐释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流派。基本上满足了编者欲统筹田野和理论两类著作从而扩大读者面向的策划编辑思路。

第四，写作队伍来自全国，阵容可观。本丛书既然称之为“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就应该最大限度地汇聚全国的学术精英加盟执笔，就应该尽可能地体现全国同行的优秀成果。然而由于诸多原因，短时期内欲在全国全面组织书稿殊不容易；且由于丛书规模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第一批专著只能以云南学者的作品为主。而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扩大其代表性，本丛书特别邀约了全国各地数十位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共同撰写《现代民族学》和《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两本书稿，此举可谓学坛一大盛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目前存在的一个明显的弊病，是缺少深度的交流和正常的批评。交流流于形式，批评误作攻击，均非正常的现象。而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或文人相轻、争名夺利的陋习，无疑是阻碍深入交流和正常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本丛书有意识地扩大作者队伍，除了提升作品质量和扩大丛书代表性的考虑之外，亦有贬抑学界不良风气，提倡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实事求是的做人和治学的目的。

以上说了编者在策划组织丛书时的几个方面的追求，它们当是此套丛书的新颖和特色之所在。当然，作为学术著作，根本的着眼点还在于质量。关于这一点，可留待读者慢慢品评赏析。如果能够多一些反响和批评，那是编者和作者求之不得的。作为编者，还希望能将此套丛书继续编辑下去，这样不仅可以弥补不足，而且可以开拓新的领域，例如选编中国学者在国外从事研究的著作等。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学者包括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者们，几乎全部选择国内做田野而走不出国门，对此国外学者早有批评。缺乏国外田野的视野，实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差距之所在。当然，这毕竟不是靠学者单纯的努力可以解决的，它还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政治环境等关系密切。不过近年来国内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捷足先登，选派了一批年轻的学者到周边有关国家从事长期的田野调查。相信再经过5到10年的时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便能突破田野的“本土化”而进入国际化的时代。

2008年，第16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将在中国昆明召开。能够承

办这样的盛会，是中国和云南学术界的光荣。那么，作为东道主，我们应该为此次大会献上什么礼物呢？对于学术会议而言，最好的礼物自然是学术成果。古言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学者之乐自然莫过于以文会友、交流切磋。在作者和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本丛书第一批印制精美的著作于大会之前问世，将为会议增添光彩，并将受到国内外广大学者和读者的欢迎。最后要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王晓燕社长，多年来，她始终热忱支持和鼓励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令人感动和敬佩；感谢与我一同主编此套丛书的夏代忠先生，在我出国期间，他承担了不少繁杂的工作；感谢负责策划和编辑此套丛书的尹杰学人、责任编辑李锦雯女士以及参加丛书写作的所有作者。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能够组织编辑出版这样一批高水平的著作，而且印刷装帧如此到位，实非易事。本丛书的问世，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状况，作为新时期的具有代表性和规模性的研究成果，必将载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史册。

2007年深冬识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

序一

王天玺

2008 年秋天，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行。与此同时，第 16 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也将在昆明举行。这两个大会，都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盛事。《现代民族学》此时出版，是献给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的一份厚礼，也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宝贵贡献。

当今世界，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已成为现实，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面临着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巨大挑战，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也必须实现从传统民族学向现代民族学的转变。这种情况为民族学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既可以为促进世界各民族繁荣进步大展身手，又可以为构建现代民族学大厦奠定基础。周光大教授和瞿明安教授主编的《现代民族学》一书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它的出版面世，是可喜可贺的事。

民族学，又称人类学，已有长远的发展历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但是民族学，或者说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却又争论很多，至今仍莫衷一是。直面这种情况，《现代民族学》全面分析了关于民族学的各种论述，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确立了这样的观点：现代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民族，是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确立这样的观点，对民族学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民族学》汇聚了全国八十多位民族学工作者的智慧，内容十分丰富，资料非常翔实。全书对现代民族学的基本概念和知识，民族学视野中的文化体系，现代民族学的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现代民族学的应用研究，以及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论述。全书力求创建一个开放的、发展的民族学理论体系，并将这些理论方法具体应用于实践，因

而是一部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适用性的巨著，不仅专业学者会重视它，广大读者也会喜爱它。

笔者一直心仪民族学研究，因公务在身，久未如愿。今奉周光大教授之命，很高兴为本书作序。

序二

何星亮

《现代民族学》一书，分上下两卷，共7篇84章。其中上卷由周光大教授任主编，王光荣教授、柏贵喜教授任副主编；下卷由瞿明安教授任主编，郑晓云研究员、罗康隆教授任副主编。全国二十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八十多位学人撰写了有关的章节。该书篇幅宏大，内容丰富，较为系统地综合归纳了国内外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并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实属可喜可贺。

丛书主编来函为之作序，诚惶诚恐，勉为其难。笔者虽从事民族学研究多年，但资历浅薄，学识有限，愧不敢当。然主编深情难却，盛意难辞，正如俗话所说“恭敬不如从命”。由于工作繁忙，再加上篇幅大，时间紧，仅是粗略浏览了一遍，对该书不可能提出较全面的评价和意见。我个人认为，该书对普及民族学知识和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具有积极的意义。这里主要就这两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现代民族学》一书，系统全面，通俗易懂，有利于民族学知识的普及。普及民族学知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学反对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认为种族、民族没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认为文化多样性和相对性是世界的客观现实，文化的差异、习俗的不同，是由于环境和历史不同而形成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它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价值是难以比较的。一切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和相对性，了解国内各民族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熟悉各民族的习俗、心理和性格，有助于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学会和掌握与异民族友好相处的方法，否则会造成许多误会和冲突。历史上许

多民族间的冲突都是由于不理解或误解其他民族的习俗或行为、观念而引起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十分需要普及民族学知识。目前仍有许多内地汉族大学生不了解少数民族情况，当他们接触到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习惯时，就认为是落后的。如果不熟悉民族学知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严重，处处以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不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习俗，民族之间就不可能和睦相处，国家统一也就没有保障。

其次，外交、外贸需要民族学知识。民族性（或称“国民性”）和民族风俗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民族学自形成之日起，西方殖民国家便把民族学知识应用于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和外交、外贸管理，许多民族学者都被安排到殖民地工作。世界上每一国家、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各不相同，文化和习俗也各具特色。如中国人与日本人，同一人种，同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但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差异很大。如果不了解日本人的民族性，不熟悉他们的思维方式，就难以做好中日外交工作。外贸也一样，需要了解对方国家人们的爱好、口味、习惯与需求，倘若不了解有关的情况，不仅赚不了钱，还有可能造成很大的亏损。例如，鸦片战争前后，英法美等国不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状况，运来大批吃饭用的刀叉、钢琴、睡衣和睡帽等。英国商人“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然而，幻想很快破灭。中国人不买外国商人的刀叉，因为中国人吃饭时使用筷子，英国舍尔菲尔德的一家有名的商行向中国输出大批刀叉，它的卖价，几乎抵不上运费。另一家著名的伦敦商行向中国输出大批钢琴，“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棉睡帽的市场也一样，它不是“每人一顶”，而是几乎一顶也卖不出去。所以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商人有四分之三“濒于破产”。在鸦片战争前后，中西贸易造成的顺差很大，为改变这种贸易逆差，西方商人便想出向中国倾销鸦片的罪恶行当。（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 83 页～86 页）。因此，熟悉各国的文化、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对于外交、外贸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军事需要民族学知识。民族学知识自 19 世纪以来便应用于军事，以解决西方殖民政府与当地土著之间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学知识则应用于对敌对国的战争。在战争期间，美国 303 名民族学家

中约有 295 名以各种方式直接参与了对敌对国战争有关的研究和咨询工作。他们自觉响应政府的号召，参加对敌国（日本、意大利、德国）国情的研究。他们都曾以其所得，提供许多重要资料，以作为军事、外交的参考。（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杜杉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第 571 页）尤其是美国民族学家关于国民性和民族性格方面的研究对美国军事当局具有很大的影响。

第四，文化遗产保护和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民族学知识。民族学注重文化相对性和多样性，认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是适应环境的产物，都有其独特价值，都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因而十分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自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不了解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独特意义，不分良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建国后，由于不了解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科学、历史、艺术和经济价值，拆除了许多大城市的古城墙，毁坏了大量的古建筑。尤其是北京的古城墙，其价值无与伦比，可以造福子孙万代。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文化受到史无前例的摧残，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被破坏。国外许多国家，十分重视本民族、本国的文化遗产，很早便开始立法保护。1872 年，日本政府发布了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法，后来发布多种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法。美国于 1906 年通过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古迹法。而我国 1982 年才有第一部十分简单的《文物保护法》。如果我国了解文化的发展、变迁规律及其价值，如果熟悉国外立法保护文化遗产的情况，就不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此外，民族学十分注重创新，认为创新是文化变迁的源泉和动力。人类文化只有通过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活力。这对于处理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创新的关系，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学问题，从上世纪 80 年代便开始讨论，至今没有达成共识。《现代民族学》一书利用大量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资料，并对建设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作了阐述。借此机会，就这一问题谈几点自己的想法。

其一，不要为学科名称争论不休。关于“民族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名称，有的认为是一个学科，有的则认为是两个学科。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民族学和人类学在理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关于

“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三个术语，国内外也有争议。美国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狭义的文化人类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基本相同。学科名称问题，各国、各地区不同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人为地划分你搞的是“民族学”研究，他搞的是“人类学”研究；你做的是“学术研究”，他做的是“政策研究”，恐怕不会使这门学科兴旺发达。在学科建设上应消除门户之见，尽量少在“民族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之类术语的争论上过多加功夫。研究者有使用自己喜欢的学科名称的权利。如果从事这方面的学者仍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学科地位将无法确立和提高，也不可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

其二，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相结合。西方民族学的研究大多是共时性的研究，如功能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结构学派、象征学派等。主要原因是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没有历史、没有文字的民族。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与西方民族学家所研究的民族很不相同：一是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并有用自己的文字或他民族的文字写成的历史文献资料。不少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 2~3 千年甚至更为久远的文字记载。二是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在 50 年代前仍处于原始状态之外，大多数民族都早已进入阶级社会，社会分化较大。多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与汉族相当，有较高的文化。三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过各种政权，有些民族甚至曾统治整个中国几百年，如蒙古族和满族，曾经是全中国的统治者。中国少数民族各种文化现象，大多都有历史记载，有的甚至源流久远。因此，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如果不了解民族历史，是不可能深入研究的。只有共时性研究和历时研究相结合，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

其三，民族志方法与比较研究方法相结合。民族志方法是西方民族学研究人员的基本功，它是在研究异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它要求调查研究者在被调查的村落或社区生活数月至一两年时间，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完整地记述该村落或社区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这种方法对于陌生的、没有人调查过而又颇具特色的村落或社区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初入门者尤其是城市里长大的研究者也有必要。而我国许多民族学研究人员，从小在本村落、本民

族地区长大，对自己家乡的情况了如指掌。另外，目前各地都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可供参考。因此，中国人调查研究中国人不能只满足于一般的民族志描述，而应把分析和探讨深层次的问题作为主要目的。在 21 世纪，民族志方法与比较研究等方法相结合，村社研究与专题比较研究相结合，才有可能取得较理想的成果。

其四，小传统与大传统相结合。大传统通常是指知识分子创造、统治阶级提倡的教化文化，也称精英文化或典籍文化。小传统通常是指乡村的民俗文化。而民族学通常被认为是研究小传统的学科。其实，大传统和小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大传统是在小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大传统形成之后，又对小传统发生影响。如果不熟悉典籍文化，小传统也不可能深入研究。例如，居住在泸沽湖畔的摩梭人的成年礼，一般选择生肖相合的人主持仪式。如果举行成年仪式的少年男女属兔，必须由属猪或属羊的男子或妇女主持仪式。其原因是什么？这种习俗无疑是受古代汉族阴阳五行中的相冲相合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即所谓“三合”：申子辰合水，亥卯未合木，寅午戌合火，巳酉丑合金，亦即猴龙鼠相合，猪兔羊相合，虎马狗相合，牛蛇鸡相合。此外，还有“六合”之说。再如，汉族地区的民间信仰和民俗节日，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很大，如果不熟悉阴阳五行，就不可能深入研究民间信仰和民俗节日。

其五，少数民族与汉族研究相结合。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视，中国民族学偏重于研究少数民族，而对汉族的研究较少。由于这一缘故，不少机构和单位及个人往往把民族学误解为“少数民族学”，或认为仅仅是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少数民族是不完全的，还必须包括汉民族的研究。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民族学、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无文字民族和后进民族曾是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政治体系的变化，民族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广，既研究无文字的民族，也研究有文字的民族；既研究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少数民族，也研究其主体民族。汉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 90% 以上，要称得上中国的民族学，就不能不去研究汉民族。其他学科对汉民族的研究，并不能取代民族学所作的研究。另外，由于中国自秦汉以来便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很

大，文化上的相互吸收也较多。中国数千年的民族关系史，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互动的历史，文化互相影响，血缘相互交融，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不熟悉汉民族的发展史，少数民族的研究也不可能深入；同样，如果不了解少数民族的变迁史，汉民族的研究也不可能全面。

其六，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相结合。民族学家把“主位”和“客位”引入民族学田野调查中，并形成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两种方法。客位研究是从研究者、文化外部的角度去研究一种文化，通常运用研究者自己或他人创立的理论和方法对被研究者的文化进行研究。早期的民族学家的研究方法大多是客位研究。而主位研究是从被研究者的、文化内部的角度去分析异文化，研究这一文化是如何适应环境的。它提倡根据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架构来研究他们自己的文化，反对用研究者的价值标准从外部去审视一个社会的文化，反对以在其他文化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理论、规律等为框架去分析被调查民族的文化。例如，结构主义采取的是从研究者的、文化外部的视角来研究的“客位的”（etic）研究方法，而象征人类学采取的则是从被研究者的、文化内部的视角来研究的“主位的”（emic）的研究方法。“主位”与“客位”研究，并不是对立的方法，而是紧密相连的方法。主位研究的主要目的除了客观地研究个别文化外，同时也为客位研究提供更科学、更丰富的个别文化资料。客位—主位研究法的提出，其目的是首先在全世界文化中，首先进行个别文化的“主位”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所有文化的比较研究，探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和个别文化的特殊性。此外，主位研究有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许多被调查者并不清楚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和变迁，不熟悉某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最初的意义，不了解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这些都需要客位研究才有可能解决。

总的说来，中西学术是两种不同的体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任何国家传统的学术文化与社会文化一样，均有其优缺。全盘肯定本民族的学术传统，不吸收国外优秀的学术文化，将落后于世界学术潮流；而全盘否定传统的学术文化，必将丧失自己优秀的学术文化传统，成为西方学术文化的附庸。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不利于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最佳方式是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与西方优秀的、科学的方